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种解读

林金忠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试图从本质层面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生成机制,因而迥然有别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停留于现象层面对经济危机所做的种种就事论事式的解释。但由于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他的论著只涉及危机的片段性和间接性的论述,因而对这些论述的不同解读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即“生产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论”。这三种理论观点鲜明,各有理论特点,但均未能构筑一个能够解释危机发生内在机制的可论辩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3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0)01-0118-05

一、经济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从未间断过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关于经济危机的经济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传统,即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般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客观事实,但否认经济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始于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视为一个具有自我调适能力的自组织系统,即便某个方面出现暂时失衡(失调),也能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发调节而自动地得以矫正,使之回到均衡状态(常态)。因此,整个经济制度被认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种种剧烈波动均为暂时的失衡(失调),在逻辑上都被视为外在因素的冲击所致,而非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基于这种认识,每当资本主义陷于经济危机时,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便会争相提出种种就事论事式的理论解释,如刚刚在全球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被解释为金融监管不力,以及华尔街金融巨头们的过度贪婪所致;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被解释为80年代的粗心大意的借贷膨胀,以及对对冲基金的过度投机所致;80年代的危机被说成70年代后期过度的政府开支所致;而70年代中期的

危机则被解释为石油价格高涨和越南战争中的过度财政支出所导致;再往前推,1929年大危机则被解释为当时不恰当的金融政策所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约二百年间危机不断,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视野里,每次危机似乎都有一个或多个、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但其中没有一个原因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与这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危机理论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试图深入到本质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存在着不同派别之分歧,但具有两个共同特点:(1)它试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中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生成机制,而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者那样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就事论事的现象层面上去解释经济危机;(2)它试图从周期性危机中演绎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向,并由此而引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这当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危机的理论中所缺失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分崩离析,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遭遇重大挫折;伴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左派力量难以壮大,而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而迅速地变成了冷门,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之类的研究自然也就少有人问津了。直至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人们似乎又重新想起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这篇文章围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关论述的三种不同解读,结合笔者自己的梳

收稿日期:2009-08-30

作者简介:林金忠(1962—),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组织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理和阐释,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概貌,展示其中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生产失调论

生产失调,指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失调。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会出现比例失调问题,但他们认为这种失调通常是由于农业欠收或战争使商业中断等外在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并且始终相信这种生产失调问题可以通过竞争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适而得到解决。其主要理由是:某一生产部门出现供给不足时其产品价格将上涨,而供给过量时则价格下降;价格变动意味着利润率的相应变动,这将诱致资本从供给过量的生产部门转入供给不足的生产部门,从而矫正了生产失调。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相当推崇“萨伊定律”,因为它否定了总体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对此,马克思所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总体生产过剩是否可能作为一种有别于生产失调的现象而存在,抑或二者压根就是一回事?

马克思指出,关于“萨伊定律”的讨论在逻辑上是相当混乱的。依此逻辑,供给与需求相等被视为供给的商品与作为需求对象的商品在价值上的等值。但是,马克思说,这种相等纯属名义上的,因为商品作为一个价值,其“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又取决于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绝不是由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1]由此可见,宣称商品的供给会自动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所谓“萨伊定律”),这种说法本身已包含着逻辑上的混乱。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生产失调现象中所看到的只是供求不平衡问题,即某些商品生产太多了,而另一些商品则生产太少了,因而自然也就看不到总体生产过剩问题。

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反对供求关系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马克思的本意是,倘若仅仅停留在供求层面上去理解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失调问题,那么,根本就没有充分理由以推导出生产比例失调必然地会导致危机。马克思所针对的是李嘉图的观点。李嘉图认为,既然生产本身是由生产成本来调节的,因而它也调节了自身。倘若某一特定生产部门的资本没有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从该部门抽出,转入需要它的其他部门。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提出了两点看法:

(1)在一个总体性的危机中,问题并不在于资本在哪一个生产部门更能获利,而在于在所有的部门都不能获利,用他的话来说:“在生产过剩的普

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2]

(2)资本积累的基本趋向是突破各种障碍,因而打破各种比例关系,而供求关系作用之下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仅仅是一个次要的趋向而已。实现资本在各生产部门间均衡分布的“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所谓合乎比例生产(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如果只是指资本有按照比例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资本因无限度地追求自身增值而必然地造成生产比例失调趋势,乃是由竞争所强制驱动的一个客观趋势。在这里,竞争的积极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强加于个别资本家。竞争,通过供求关系的压力作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但是,竞争又通过驱使资本家竭力发展生产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超出其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当一个生产部门超出其市场限度时,将促使与它互补的生产部门接着也出现生产过剩,由此便可见,生产失调并不局限于一个生产部门,而必然总是总体性的现象。在竞争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出现比例失调的趋势,与竞争再一次将比例协调强加于资本的趋势,这两种趋势是交替作用的,因而生产比例协调的实际恢复就反而成为一种纯属偶然的事了。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区分了特定部门的生产过剩与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所看到的只是特定部门的生产过剩,因而未能清楚地做出这种区分。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生产失调论”还只是对危机现象的一种表层解释,危机的根源最后还是要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纵观马克思的充满思辩色彩的话语,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思想似乎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取剩余价值,而在竞争的外部强制驱动之下,资本的谋利目的必然意味着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因而存在着冲破生产部门间比例的内在趋向,这一趋向与生产比例协调作为一种客观事实限制了资本获利的无限性,而这两种趋向之间是矛盾冲突的。这一矛盾决定了生产失调与总体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常态。笔者认为,这是对危机现象的本质层次的一种揭示。然而,问题还在于,以此去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内

在原因仍过于抽象,因为危机的具体发生机制仍旧是模糊不清的。

三、消费不足论

关于特定部门的生产过剩与总体上的生产过剩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似乎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趋向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的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并体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显然,这里存在着一对矛盾,即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向与将生产限定于获取利润的限度之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解读出两个要点:(1)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限制,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限制;(2)这种限制是与资本本性上总是超越任何限制的趋向是相互矛盾的,生产过剩便根源于这一矛盾。

马克思似乎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限制与其总是要冲破这种限制的趋向之间的矛盾,由此而产生的生产过剩和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趋于加深加重。这一思想,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论及“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在那里,马克思甚至断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笔者认为,更为合乎逻辑的解读应是: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处处强调剩余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限制,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问题牵涉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作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实现之基础的需求源泉,虽然包含着工人阶级的消费性需求,但更多地还是资本家相互之间的生产性需求;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达,劳动分工越是发达,亦即生产迂回程度越高,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所占比重也就越高,因而剩余产品的价值实现则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性需求。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并不能被简化为工人阶级的有限的消费问题,而应当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说“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界限”这句话时,他所指的并不是人民群众的有限的消费能力,而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只有当工人的工资以能够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为限度时,他们才有可能被资本所雇佣。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积累有一个绝对的限制,而在于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多限制。应该加以强调的一个关键点则在于,虽说一个特定的危机可以因各种具体原因(包括偶发因素)而发生,但最终的根源则在于资本无限地扩张其生

产力以至于超出了获取利润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利润,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能力。总而言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最后还是要回到作为资本的内在限度的生产与增值之间的矛盾。资本趋向于无限度地扩张其生产力,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占有和实现剩余价值。后者便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限度,而资本又总是寻求突破这种限度。必要劳动是一个限度,但不是作为需求来源的那种限度,而是作为剩余价值来源的限度。

马克思还提出对于交换的两个具体的限度,这些限度都是资本视为障碍而要加以克服的。第一个限度是:只有当剩余劳动与剩余劳动相交换时,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再生产。剩余劳动与剩余劳动相交换乃是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第二个限度是:资本总是企图通过将必要劳动压缩到最低水平来扩大剩余劳动,这就使得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趋于不断增加。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便如此,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与限制工人需求的趋向之间的矛盾,仍旧还是不能作为危机理论中的“消费不足论”之充分依据。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由于劳动生产率越是提高,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也就随之越大,因而在利润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利润率却趋于下降。随着资本的扩大,为了保持资本效率(即马克思所说的“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原则),劳动生产率更大比例的提高便成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倘若不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就宁可从流通领域(从而生产领域)中撤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需要实现价值的剩余价值大量增加,导致凝结着剩余价值的商品数量的大量增加,而与此同时,提高利润率,防止总体利润率水平的下降,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上述是笔者为了辩驳“消费不足论”而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解读。尽管这样解读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与他的论述的整体逻辑更为一致,但是笔者依然认为,即便如此,马克思对危机的阐述仍旧还是停留在抽象层次上。据此抽象阐述,关于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乃至危机之根源,仍旧给不同解读留下相当大的余地。事实上,在上一段引述中,便已包含着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另一解——利润率下降趋势论。

四、利润率下降趋势论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之说,曾经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这一问题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报酬递增问题的争论中还被反复涉及。众

所周知,马克思谈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彼此密切相关的^[3]。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理论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论”的争论,关键问题恰恰也与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有关。

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关于“工资”的系列演讲稿中,这比他运用这一概念去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大约要早十年。在演讲稿中,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去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目的在于说明人口过多并不是相对于生活资料有限生产的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替代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资本的价值关系的变动并不必然地反映为技术关系的变动,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情形,即如果劳动力价值并没有显著降低或降低幅度较小,而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幅度大于其数量增长的幅度,那么资本有机构成就可能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下降。马克思似乎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逻辑漏洞了,他试图改进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概念本身。于是,在他亲自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便区分了资本的技术构成与资本的价值构成,前者是指生产资料与活劳动之间的物质关系(技术性的关系),而后者是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关系。接着他把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做了似乎更为精确的定义,即“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然而笔者认为,即便在这种定义改进之后,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之说依旧还是牵涉多个变量之间的量的关系问题,其背后隐含着分析之方法论问题。实质性问题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否属于一种一般性或规律性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学习体会是,马克思的分析至少在逻辑上存在着漏洞。一方面,他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种比较静态分析的范畴,亦即在阐述局部的量的变动时,始终都隐含地假设其他的量保持不变这一前提条件(所谓*ceteris paribus*);可是另一方面,他却断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乃是一种一般性的趋势,亦即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性的特征。很显然,将比较静态意义上的局部分析结论加以普遍一般化,这是一个逻辑漏洞。如此一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之说便难以避免地招致诸多批评。一些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概念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保护其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的假说,因而为其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提供逻辑上的支持,却忽略有可能否定

这一假说的价值关系的变动。对此,费恩(B. Fine)和哈里斯(L. Harris)试图回应这种批评,他们认为,要区分技术变动的即时性的影响与长期性的影响,即时性影响可以从价值变动中抽身出来,而长期性影响则伴随着价值的相应变动^[4]。笔者认为,这种批评并非是全无道理的,而这种回应则仍旧是软弱无力的。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引入资本有机构成这一重要概念,在1847年12月马克思关于“工资”的系列演讲稿中原是用于论证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相对人口过剩方面,而不是为了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点,在《资本论》第1卷中也还是如此。马克思的核心论点是,伴随着资本积累过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其必然结果便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以此,马克思试图阐明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矛盾的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性。其实,类似的论点在古典经济学中也能找到,比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版对《论机器》一章所添加的补充部分中,也谈到了机器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直接影响是导致“技术性失业”的增加。马克思与李嘉图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马克思引进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概念以取代李嘉图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概念,他的分析借助于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概念;二是马克思对这种影响的历史趋向的认识完全不同于李嘉图,因为李嘉图深信,从长远来看就业将得到恢复,因为利润的增加将会提高资本积累率,从而增加就业总量,而马克思则认为相对人口过剩那是资本积累的一种历史趋向,可以引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方面。不过,笔者认为,在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李嘉图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问题要害之所在,要害在于:马克思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仍旧属于比较静态分析的范畴,换言之,当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相对过剩人口时,他实际上已经隐含地假设了劳动力价值和资本总量保持不变这一前提条件。倘若放弃这些假设,那么,在劳动力价值下降和资本绝对量增大的情况下,所谓相对过剩人口之说就不是必然成立的,因为劳动力价值下降意味着给定的资本总额可以雇佣更多数量的劳动者,而资本绝对量的增大则意味着就业绝对量的增加。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看不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利润率下降趋势之间有什么逻辑上一般的和必然的联系。如果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也只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假设的情形之下,即假设剩

余价值率和资本总额是给定的,于是利润率下降趋势便直接地作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的结果。但是,马克思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将是一个相反的抵消因素;而且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抵消因素,而是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因为它们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两个互补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马克思却始终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可能的特殊情形,即如果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幅度大到足以完全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合乎逻辑的结果应是利润率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在无法否定这种可能的特殊情形的条件下,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利润率下降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都无法成为一个一般性的和必然的规律。

上述论断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起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论”提供了经典理论依据。然而,纵观马克思的论述,除了只言片语之外,我们始终都看不到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起来的完整的表述。就在上面一段引文之后,马克思从利润率下降趋势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和最终结局,他花费了相当长的篇幅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描绘出一幅末日般的景象。这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提供了经典依据。

五、结论和启示

(1)纵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有关论述,其最有深度也最有价值的一点在于,他将危机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本身,这一点贯穿了马克思所有的论著,也成为与两种传统的危机理论的基本区别之所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具体化为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家那里的表现形式是他所生产的产品与市场限度障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同时指出,对于资本来说,这些限度障碍是可以突破的。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而这种发展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来实现的,即:一方面通过科技进步而最终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外扩张而实现世界市场的开发。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资本有能力突破一切障碍,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驱使它无限向前推进。但资本依旧是矛盾,它只能暂时性地延缓矛盾,却不可能根本

性地解决矛盾。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矛盾”。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李嘉图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增长趋向,却忽略了流通上的障碍,因而他只看到矛盾的积极的一面;而与李嘉图相反,西斯蒙第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在消费方面的障碍,却忽略了资本冲破障碍的内在驱动能力,因而他所看到的只是矛盾的消极的一面。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根本消灭经济危机,但也不可能在某一次危机中突然灭亡。

(2)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产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三种理论似乎是“和平共处”的,至少表面上似乎是以“消费不足论”观点看问题的,他把商品生产过剩与市场开发的限度联系起来;然而,也是在这部手稿中,在谈到了较为具体的危机问题时,他又将危机问题与“生产失调论”联系起来,他试图阐明“生产失调论”与总体生产过剩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长期性规律问题,并隐晦地将它与危机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启示,即至少在本质层面上,能否将三种不同的危机理论彼此调和起来,以统合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呢?笔者认为,这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理论研究任务。

(3)马克思关于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论述仍停留在相当抽象层面的演绎上。问题在于,这一矛盾能否被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从而构筑一个可论辩的乃至可验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个共同弱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待于去完成的一个任务。无论是“生产失调论”还是“消费不足论”,或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论”,都未曾完成这一任务。与此相比,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恰恰长于危机机制的具体分析,因而或许可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借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8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
- [3]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 [4] CLARK, SMON. Marx's Theory of Crisis[M]. London: Macmillan, 1994: 72

[责任编辑:孙浩进]